

有關團體，Yalom 他們說清楚了嗎？

吳秀碧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退休

緣起

台灣在團體諮商與治療的發展，自 1971 年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系(輔導與諮商學系前身)開辦與設置團體諮商課程以來，已經近半個世紀。無論是在團體研究方法、研究表現、實務工作等都逐漸趨於成熟，迎頭趕上國際水平。但是，反觀在團體諮商與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論，則幾乎完全模仿西方，沒有自己的理論或原理，或模式，然而西方的團體諮商與治療也不是完美無缺。乃本著「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精神，檢視和評論現有理論，期待以西方先進的成就為基礎，可資我方發展新論的參考。故應本學報總編輯王麗斐教授相邀撰寫專論文章時，乃以此題目，野人獻曝，當作只是一顆投石問路的小石子。

個人學習團體諮商與治療的生涯，最尊敬的兩位學者之一，便是 Irvin D. Yalom 博士。雖未曾與其謀面，但是長期神遊在他的團體心理治療理論，以及其他 Yalom 自稱為教學小說（teaching novel）的書籍，例如「尼采哭泣了」等，十分讚嘆其論述精闢，文采豐沛。故本文特以「有關團體，Yalom 他們說清楚了嗎？」為題。這裡所謂「Yalom 他們」四個字有兩種意涵：第一，意表西方的理論；第二，意表心理動力取向的團體諮商與治療理論，主要因 Yalom 的人際互動團體心理治療亦屬於心理動力取向的人際治療的一支，且對台灣諮商界有很大影響。此外由於個人在團體諮商所受教育和訓練，以及從事教學、訓練與實務等，都以心理動力取向的團體諮商與治療為主，因此本文探討的議題以心理動力取向的團體理論為限，並以非結構團體（unstructured group）為背景。

其次，當翻閱台灣有關團體諮商入門課程使用最普遍的教科書，Gerald Corey(2011)所著作「團體諮商的理論與實務」(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counseling)，在第二篇（Part II）「團體諮商的理論方法」(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group counseling)，從第一個理論「精神分析論」起共有 11 個理論，無不與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論共用。其他在美國較為重要的團體諮商有關書籍情況也一樣，都介紹相同的重要學派（Hansen, Warner & Smith, 1976, 1980; Vander Kolk, 1985）。而有些書籍名稱甚至使用「團體諮商」與「團體心理治療」兩者並列，例如 Vander Kolk (1985) 的著作，即名為：「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概論」(Introduction to group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再則，不論在美國或台灣，諮商研究所博士班團體課程必用教科書，就是 Irvin D. Yalom 的經典著作：「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故本文將不特別區分團體

諮商和團體心理治療。最後，由於當代心理動力取向的團體諮商和團體治療都源自於傳統分析論。歷經 80 多年，因新分析論的發展和實徵研究發現的積累，當代心理動力取向的團體理論發展相當蓬勃，也很多元。實徵的證據固然重要，然而最好能用來佐證理論或有理論詮釋實徵發現。若只以各種實徵發現作為實務依據，沒有前述考量，有時可能因拼湊而失去系統化與統整性。本文所選的三個議題，或在理論或在實徵發現的應用似乎有待再澄清和統整，所以特提出來討論。

有關心理動力取向團體三項議題

在說明本文立場之後，以下分別就諮商與治療團體的團體三個層面、團體歷程發展與階段模式，以及團體初期領導者角色等與團體歷程發展相關的三個議題討論如下。

一、團體三個層面之理論瑕疵

首先要討論的議題為有關團體三個層面。團體有三個層面，為領導者在團體歷程工作聚焦和焦點轉換所在，即：個人層面、人際層面和團體層面。三者皆與歷程的催化和治療性的衝突運用等關聯密切。分析學派的團體心理治療理論源自其個別治療理論，因此完全從成員個人內在精神層面（intrapsychic）的投射和移情去詮釋團體的三個層面現象。早期的精神分析論學者，比較重視團體中個別成員和領導者在團體歷程的早年客體關係。傳統的分析論對於移情的定義，是指成員與領導者關係再經驗戀母情結（Oedipal）議題，以便可以經由領導者協助而解決早年的問題。因此被認為只是在團體中進行個別分析治療，不是團體心理治療（Gladding, 1995）。後來由於客體關係論的貢獻，能夠解釋團體層面的現象，才解決這個窘境。

1947 年 Spotnitz 從 Freud 的理論，提出在團體情境有三種情感的情緒流動（emotional currents），這種流動也可視為力量的星座（constellation of force），他所謂的星座是指情感元素，與阿德勒的家庭星座意義不同。他的理論成為分析論者了解團體心理治療的重要根據（Rosenthal, 2005）。其後英國分析學者 Schindler（1951）根據 Spotnitz 的理論，主張我們對於社會或團體的態度，以早年已經建立起來對於母親的態度為基礎。後來 Spotnitz（1961）也提到團體成員對於領導者全然如其父親或母親，也可能遷移他們的情感到「團體整體」（group as a whole）如同另一個父母（as other parent）（即領導者之外的父母）。到了 Slater（1966）更進一步討論成員知覺團體為一個整體的動力，團體有時給成員體驗到撫慰、安撫和作為避難所；有時這個「母親-團體」（mother-group）則是可怕的。此後客體關係理論乃將「團體整體」視為成員個人早期對於母親態度的移情。

由於客體關係論能夠解釋團體整體的動力和在治療的運用，而突破只能在團

體處理個人層面的議題，才使精神分析理論從 1930 年代起致力於建立團體治療的方式，經歷約 30 年間，到 1960 年代終於可以被承認為一種團體心理治療的方式。晚近 Rosenthal (2005) 也主張團體整體如母親，並認為：「作為領導者會去看和體驗團體如同一個母親的傾向，乃是無可避免」(p.147)。從 Rosenthal 的觀點，領導者對於團體和成員都會發展反移情，且領導者和成員一樣，也會對於團體整體的反移情如同早年對待母親的情感和行為。

在團體層面，對於分析論學者主張成員所知覺的團體整體為早年對於母親態度的移情，個人感到質疑。由於 Schindler 曾陳述：「每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團體，而每一個團體建立在一個家庭的型態 (pattern) 上，因此治療性的團體呈現家庭關係的型態。各個團體成員是兄弟姐妹；領導者若是男性，便如同父親，當團體為一個整體的時候，理所當然如同母親」(p.10)。顯然就 Schindler 的主張來看，「每一個團體建立在一個家庭的型態上」，已經明白道出成員對於團體的投射，是個人早期家庭經驗的複製。足見 Schindler 在個體層面是從「成員-領導者」移情去理解和解釋成員個人內在動力；在人際層面則從家庭手足關係去理解；然而卻在團體層面和個人層面一律都視為早年對母親態度的移情。家庭是一個團體，團體一向被認為大於其所有成員的總和。而且一個人對於母親和整個家庭的情感情緒經驗並不能畫上等號，也應該很難以將一個領導者和一個團體視為等同，都是成員個人早期對於母親的態度之移情。

而且 Schindler 的那一段話與 Adler 的理論很近似。Adler 提倡人具社會性的人性觀，家庭是一個系統或星座 (constellation)，包括父母和子女，甚至大家族，星座為一個家庭關係的聚集 (collection) (Adler, 1930, 1938; Ansbacher, H. L. & Ansbacher, R. R, 1956)，可見 Adler 理論的重點在人際。而 Schindler 仍舊沿用 Freud 和 Spotnitz 的性驅力觀，似乎不如以 Adler 觀點來詮釋成員對於團體的移情來得更合宜。Trotzer (2013) 也主張將團體視為成員個人所投射的一個原生家庭。在諮商團體中，每一名成員都在反映著他的原生家庭承傳，這是影響團體歷程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Adler 學派主張個人早年形成的家庭星座和生活風格 (life style)，有三項作用：(1)協助個人了解自己和世界；(2)用以預期或期待自己和世界彼此會如何相對待；(3)由於個人會帶著他的生活風格到任何情境，因此也會帶到治療情境用以了解治療師和治療過程 (Mosak & Fasula, 2011)。所以個人不只用來瞭解治療可能發生什麼，某種程度上也用以控制整個治療過程將發生的。由此可理解成員對於領導者和團體的移情，是為了去試探領導者和團體。

可能受到分析論在詮釋團體三個層面的窘境影響，到現在多數心理動力取向的團體理論在團體的三個層面論述，除了個體層面與人際層面之外，在團體層面還很難有確切的理論去詮釋。即便如 Yalom 很努力要擺脫分析論的窘境，使用了「團體整體現象」(group-as-a-whole phenomena)、「社會微縮理論」(social microcosm theory)、「鏡廳」(hall of mirrors) 及「原生家庭團體矯正性重現」等四個與團體整體有關之概念，還是有一些待釐清之處。

Yalom (2005) 的團體理論主要也以心理動力論為核心。在個體層面，Yalom

同意分析論主張成員個人對領導者的移情，如同在個別治療；在人際層面，他也使用移情解釋成員彼此之間的關係。Yalom 如此描述成員人際移情的過程：「人彼此的關係不以對他人實際歸因，而是主要以存在前者個人幻想的化身為基礎」（Yalom & Lesczc, 2005, p.21）；在團體層面，他則很聰明的迴避繼續使用分析論觀點。因此三個層面的理論如何統整，實有待檢視。雖然 Yalom 並不認同 Wilfred Bion 和 Tavistock 方法，尤其是被他認為「不可理解的和疏離的」（p.191）領導方式，然而還是受到英國 Tavistock 方法（Tavistock approach）的影響，Yalom 企圖從社會-心理學（social-psychology）的現象和動力的觀點去詮釋團體整體。他使用「團體整體現象」來詮釋規範建立、角色變異、次團體、凝聚力等等團體共同的現象（Yalom, 1986）（Yalom & Lesczc, 2005）。其次，他也以「社會微縮理論」來看團體整體。Yalom 如此描述團體：「一個自由互動的團體，只有些微的結構限制，終究將發展出一個由參與的成員所形成的社會縮影」（Yalom & Lesczc, 2005, pp.31-32）。成員因其不良適應的人際問題來到治療團體，且在團體重複那些問題而形成一個如同真實社會樣貌。顯然 Yalom 並未如 Schindler 和 Spotnitz 等人的觀點，從成員個人主觀內在精神動力去看團體層面，而是從社會-心理角度去解讀團體現象，在心理動力取向這是一大躍進。但是，他也只說明「團體整體現象」作為歷程評論之用，以及社會縮影在成員組成的應用。並沒有告訴我們團體整體現象與社會縮影的關聯，以及團體在哪一個階段發展成為社會縮影。只有提到「團體中的互動越自發，社會縮影的發展越快速與真實」（p.41），這樣模糊和不夠統整的說明，很難給領導者一個明確的領導指引。

此外 Yalom 也主張團體如同一個「鏡廳」（Yalom & Lesczc, 2005, p.364）。由於「鏡照」（mirroring）就是反映自我，在團體中成員在遇到其他成員或領導者，甚至團體整體的時候，會從他人身上看到自己。成員個人將會面對自己和自己生活的各方面。顯然這個「鏡子」概念是來自社會學家 Cooley「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的隱喻（Cooley, 1902）。不過這個「鏡廳」隱喻是藉由團體反映個人內在精神層面，也就是只能用以詮釋個體內在自我層面，與將團體視為一個整體來詮釋團體現象有所不同，亦即無法詮釋團體層面的現象。最後，可以看到 Yalom 也想從實徵研究發現來詮釋團體整體。他發現「原生家庭團體矯正性重現」的療效因子，並認為：「治療團體在很多方面類似一個家庭：有權威/父母人物，同儕/手足人物，深度的個人揭露，強烈的情緒，既有深度的親密，也有憎恨、競爭的情感」（Yalom & Lesczc, 2005, p.15）。然而，Yalom 並沒有明確指出，這是他用來詮釋團體為一個整體的依據。

Yalom 的困境可能受限於他的階段模式是依據 Tuckman（1965）實證發現的模式而來有關。團體整體與團體階段發展有關聯，只有實證，沒有理論基礎，便無法說明團體類似一個社會縮影或一個家庭複製和團體歷程發展及階段特徵的關聯。儘管 Yalom 使用了如前述四個與團體整體有關的概念，然而他的理論在團體層面的詮釋，仍令人感到模糊、不確定和不統整。Yalom 的努力和開創很令人讚佩，不過他試圖引入社會縮影和家庭星座等理論，卻都點到為止和散見在書

中不同章節，未能有系統的統整在他的團體發展和階段模式中。

Cottle (1968) 主張引入社會學理論來解釋團體中的一些過程，而不能只從傳統分析論的移情去解釋團體的移情與衝突。他特別強調在團體工作中，治療師需要知道的遠超過於只知道他的個別病人的精神官能。治療師需要了解集體性的攻擊 (collective aggression)，以及儀式化推翻原始部落的族長父親。或許攻擊治療師帶有原來傳統精神分析的戀母性質，但是治療師如果對於社會學的過程沒有足夠的理解，就無法理解集體的攻擊行動，便無法作出有生產性的解釋。由於團體面向的多元，顯然單一理論很難面面俱到的充分詮釋各層面。由此，若要有系統的了解團體歷程發展和其三個層面，除了心理動力論之外，可能引進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範疇相關的理論，可以補足心理動力理論的不足，使團體理論的建構更臻於完善。

二、團體歷程發展與階段之原理待建構

其次，要檢視的議題為團體諮商與治療的團體發展與階段的模式。綜觀各團體諮商與治療理論的長篇論述，最大興趣都在其治療理論、治療程序與介入方法和技術，而在團體發展與階段的詮釋幾乎沒有或沒有太多著墨。在 1980 年代 Vander Kolk (1985) 的「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概論」這一本書，甚至都沒有提到團體的發展與階段模式。分析論的個別治療重頭戲在誘導病人對治療師的移情，而較少在治療關係發展歷程有關之論述，或許受到個別治療以論述治療關係的性質為主之影響，以致在團體發展與階段模式之理論被忽略了。然而團體發展與階段模式與團體歷程催化和領導的關係特別密切，實不容忽視。雖然在 Corey (2011)，Yalom (2005)，Gladding (1995) 等人的書中有特別章節描述團體的發展與階段模式，但是這些階段模式幾乎都可以被辨識出來，主要以 Tuckman (1965)、Tuckman 和 Jensen (1977) 的團體四階段模式：「形成」(forming)、「風暴」(storming)、「規範」(norming) 及「表現」(performing) 等四階段為本，再融入個人理論取向和實務經驗的詮釋和修改。尤其是 Corey 的「團體諮商理論與實務」書中對於團體階段模式，從最初的版本到 2015 年的第九版有很明顯的修改。當前 Corey (2015)，Yalom (2005) 兩者都提出團體兩個時期含五階段的模式，包括團體初始時期的「開始」、「衝突」、「凝聚」三個階段，以及團體後期的「工作」與「結束」兩階段。當前這兩位學者的階段模式可能最為普遍。Gladding 則將 Tuckman 模式中的第二「風暴階段」和第三「規範階段」合併成為一個「轉換階段」(transition stage)，而形成「初始」、「轉換」、「工作」和「結束」等四個階段的模式。Gladding 的模式在探討團體階段發展時，具有作為實徵研究依據之實用價值 (Lewis, Beck, Dugo, & Eng, 2000)。

Tuckman (1965) 的團體階段模式，主要從治療團體、T-團體和實驗團體等不同團體的 50 篇實徵研究所得。這個模式最初普遍被「人的關係發展」(Human Relational Development) 團體的實務工作者所鍾愛，後來才出現在團體諮商與心

理治療的學術文獻當中（Bonebright, 2010）。若從團體諮商與團體心理治療的發展史觀之，便不難理解何以如此。1930 年代為團體諮商與團體心理治療發展很重要的時期。在 1930 年代出現很重要的一些事件，包括：J. L. Moerno 為首位向助人專業者介紹「團體治療」與「團體心理治療」兩個名詞的學者（Corsini, 1957）；R. D. Allen（1931）則是第一位使用「團體諮商」這個名詞的學者；還有社會學在團體成員研究的貢獻，顯見社會學和團體諮商與團體心理治療的關係早已開始，不容忽視；而另一件很重要的事，為精神分析論開始團體分析形式。不過團體的蓬勃發展則肇始於 1960 年代，當時 T-團體和實驗團體等相當普遍，還有 C. Rogers（1970）的會心團體（encounter group）（Gladding, 1995）。後來這些團體演變成很普遍的個人成長團體（personal growth group）。從探討團體歷程的理論角度，Rogers 的會心團體值得注意之處，為 Rogers 從實務提出了團體的階段模式，不過由於被認為與其特殊理論的領導有關，因此未普遍。反而是 Tuckman（1965）的階段模式相當普遍，可能與當時盛行的團體，即與 T-團體有關的其他團體有關。由於 Tuckman（1965）、Tuckman 和 Jensen（1977）的階段模式來自實徵研究，也就是目前諮商與治療團體普遍的階段模式主要從實徵研究而來。Tuckman 這個得自實徵研究的模式，雖然可以告訴我們團體發展的階段特徵，卻無法告訴我們團體歷程如何發展。亦即可以告訴我們團體階段「什麼」（what）特徵，卻沒有告訴我們團體「如何」（how）發展和出現階段特徵。由於團體初期的領導特別重視歷程的催化（Yalom, 1995; Yalom & Leszcz, 2005; Gladding, 1993），如果一個階段模式只能提出階段特徵，而無法說明階段發展的原理，便難以提供在各階段領導應有的任務、功能和角色之指引。換言之，無法提出催化團體歷程的原理。

個人特尊敬的另一位學者，便是 James P. Trotzer 博士。個人在碩士學習階段受到 Trotzer 博士最大啟迪，即在有關團體階段的思維。在他的著作：「諮商師與團體」（The counselor and the group）（1979, 1999, 2006, 2013）書中，強調需要有一個心理學的架構作為詮釋團體歷程的指引。他並認同 Jourard（1968）的觀點，主張只有模仿他人的理論或原理是不充足的，每位助人者需要發展自己真正能夠有效助人的理論觀點。因此，Trotzer 根據 Maslow（1943, 1954）的人類階層需求理論建立他的團體發展五階段模式（Trotzer, 1979, 1999, 2006）。主要原理在於基本需求成為每一個成員在團體環境的互動發展出關係的動機，並在關係中成員可以去說出和解決他們個人的困擾。由於他的階段模式有理論基礎，因此不只可以說明團體歷程的發展和階段特徵，且可以據以指引領導者在各個階段的角色與任務，以促進團體的發展與演進。因其階段模式是以成員個人內在心理需求為本，所以應可與分析論一同歸類在以個體內在動力詮釋團體歷程的理論取向，導致也難以詮釋團體層面的現象。所以 Trotzer 試圖引進家族治療理論去詮釋團體整體，然而只有引入少部分概念，並且也未和其團體發展和階段模式整合。由於他的興趣在提出一個用以協助成員解決問題和促進發展的團體理論，所以一方面很少團體心理治療學者和實務工作者引用他的理論；另一方面他的書籍內容以其個人理論為主，不若 Corey 的書籍綜合介紹各學派，因此也很少被使用作為入門課程的教

科書。前述兩個原因影響其團體階段模式的普遍性。雖然如此，Trotzer 是唯一努力以一個心理學理論去建構團體階段模式者，可以成為鼓勵後人致力於尋求適當理論，來發展團體階段模式的先鋒典範。吳秀碧（2005）也在這個議題上以社會心理學的人際理論來建構團體歷程發展和階段模式。期待進一步能嘗試整合社會心理學的人際理論和其他動力治療理論，作為同時可以詮釋團體歷程發展和團體的三個層面的模式，使團體歷程催化和治療介入在理論與實務更為統整。

三、團體初期領導者角色的爭議

本文檢視的第三的議題，與前面團體階段議題息息相關，為團體初期領導有關議題。此處非探討廣泛的初期領導，僅以初期領導者所擔綱的角色為限。如前述，心理動力取向的團體理論源自精神分析治療理論。由於 Freud 在治療關係主張分析師必須謹守中立（neutrality）、禁止情感（abstinence）、不透明（anonymity）的三大原則，影響所及為領導者在團體中一如個別治療情境的做法，企圖讓成員在無助之下產生退化，促使下意識憶起早期來自與母親之間的挫折所產生與壓抑的憤怒，以便對治療師產生移情作為治療的介入。然而團體情境為多人情境，移情所引發的衝突來源和原因遠比個別治療複雜，以及難以控制。雖然當代心理動力取向的團體治療已經不再拘泥這種傳統作法，然而除了利用實徵研究結果調整作法，並沒有說明原理或理論依據。故仍舊遺留幾個有待澄清的部分。

首先，傳統分析論誘導當事人移情的方法，有認為治療師可以操縱當事人的情緒之意涵。事實上，這樣的團體治療師行為就是冷漠的、有距離的及無作為的角色，確實扮演「壞客體」的樣貌呈現在團體成員之前，並非如 Yalom 所隱喻的「空白銀幕」（blank screen）（Yalom & Leszcz, 2005, p.202）等待成員來投射的角色。分析論的治療師利用先扮演一個「壞客體」，而不是治療師本身真實樣貌，誘導成員對他發生移情，產生衝突之後，再還原到治療師的實際樣貌，呈現「好客體」角色，以提供成員矯正性情緒經驗，繼之再進行對這個移情和反移情動力的解釋。換言之，治療師在誘導成員的移情之後，再提供成員「一個好的經驗」，這個經驗具有「矯正的」（corrective）意義，與成員期待的正好相反。這就是 Knight（2005）所謂：「壞客體重演原則」（principle of bad object reenactment）的矯正性情緒經驗治療方法。

移情可因學派有不同的定義（Mosak & Fasula, 2011），Gelso 和 Carter（1985）的定義，為：「移情導致對治療師一個錯誤的知覺和錯誤的解釋，不論是正向的或是負向的」（p.170）。普遍同意的定義，約為：一個人不把對於另一個人的看法和關係歸因於後者的現實（reality），而是代之（displacement）以前者早期與重要他人的關係和情感情緒。因此如果「事實上」領導者已經刻意扮演一個「壞客體」角色，這一個「壞客體」角色在治療當下對於成員就是一個「現實」的壞客體。成員確實面對了一個令人挫折的領導者，因而活化了過去記得的學習來應對面前這個陌生的人--領導者（Anderson & Beck, 1998）。用普通常識來說：你就

是個壞人，怎能冤枉是對方的投射和移情；假如你是個好人，而對方卻將你看成是個壞人，這樣才可以歸因對方的投射與移情，不是你的現實。如果只為了誘導成員的移情，來看看成員過去和母親的經驗，Alexander 和 French（1946）便認為當事人的問題可能會出現在治療情境，假如治療師傳遞一個誘導當事人的反應，可能很難說服當事人，他們的反應真的就是早期型態的重複，而不是對治療師的自動性反應。即便沒有早年父母移情議題的成員，在非結構團體情境，也會對於這樣一個冷漠、有距離，且不給於任何指引的領導者角色感到挫折。如此，團體衝突原因便變得複雜，而難以確定。

其次，在治療歷程，病人不只尋求好的父母或好的客體，也尋找壞的客體。由於在病人過去的依附經驗，有好的，也有壞的，有安全的，也有不安全的（Knight, 2005）。因此，在團體初期的情境若領導者刻意只扮演「壞客體」角色，對於不是尋找「壞客體」的成員又當如何？如果領導者並未刻意呈現一個「壞客體」角色，而以實際的自己呈現，當成員投射其內在的「壞客體」在治療師身上，這樣似乎比較合乎移情的定義，也可以理解這個成員所尋找的「壞客體」。即治療師不刻意扮演「壞客體」角色，則不論尋找「壞客體」或「好客體」的成員，都能投射其早期經驗的情感情緒，領導者可因其移情而辨識其早期的議題。此外在團體情境，由於當事人和治療師的移情和反移情可能不限於父母權威移情的動力，也可能對領導者發生手足移情的動力（Moser, Jones, Zaorski, & Mirsalimi, 2005），而成員之間也可能發生手足移情。在團體情境，領導者若以「壞客體」的角色所引發的團體衝突，在團體情境的歸因將變得極其複雜，難以解釋。從理論而言，移情的主控者不是治療師，應該是當事人。在團體初期對於不認識領導者廬山真面目的成員而言，領導者無須扮演「壞客體」，團體成員的移情還是會發生，因為移情是生活中人際普遍現象（Anderson & Beck, 1998）。除非成員開始發展對於團體中的人的分化（differentiation），否則在團體歷程和情境中隨時都可能發生移情，何必一定要誘導。再則除了移情，團體中還有其他重要治療因子。所以相對的，移情在團體治療不如在個別治療中優先和唯一（Yalom & Leszcz, 2005）。所以，領導者在團體初期何需扮演「壞客體」。

Bion（1961）曾描述參與非結構團體個人會呈現出相當退化，反映出對於依附和接納的焦慮。克制而無反應的治療師（non-responsive therapist）提高了成員的退化，以使用以闡述個體對這些力量（forces）的反應；而催化的、互動的治療師則減少這種現象。晚近由於實徵研究的影響，心理動力取向學者已經不再沿用傳統分析論的「壞客體」角色作法，例如 Yalom 便主張在初始的團體需要引導和結構，以避免「一個沉默的領導者將擴大焦慮和增強退化」（Yalom & Leszcz, 2005, p.217）。然而修正「壞客體」角色的理論依據又何在？如前述不能只依據實證研究的發現。分析論在團體初始的領導使用「壞客體」角色，刻意引發成員的衝突，雖然有可議之處，至少與其理論的領導企圖和任務一致。而現在心理動力論的學者，包括 Yalom，只依據研究發現改變作法。想呈現「好客體」嗎？或改變成怎樣的領導者？若沒有理論指引，究竟領導者的企圖和任務是什麼？給什麼指

引和結構?該給多少引導和結構?與個人的團體治療理論如何統整?便無所依循。

雖然治療團體的目的和任務不同於一般組織的團體，也就是不同於任務取向的團體，然而也是一種有組織的團體。至少在團體開始便明文規定有領導者和成員兩種角色的組織。在組織心理學有關領導行為與領導情境方面的研究，主張「權變理論」(contingency theory)的 Fiedler (1967) 認為領導情境包含三個向度：(1) 領導者與成員的關係，(2) 任務結構 (task structure)，(3) 職權 (position power)。並將領導行為分為關係導向 (human-relation oriented) 和任務導向 (task oriented) 兩種類型。House (1971) 研究發現：當任務結構清楚、權力系統高度正式化、且制式固定化等情境，適合「支持式領導行為」；當任務結構不清楚、團體內部壓力高且易有衝突、成員外控人格特質等情境，適合「指導式領導行為」。另有學者發現，團體屬於低度控制的情境，比較適合「工作領導行為」(Fiedler, Chemers & Mahar, 1976)。非結構團體諮商與治療可以歸屬於低度控制的情境，在團體初期領導者與成員之間及成員彼此之間，都尚未發展出親密關係，而且除了領導者和成員兩種角色之外，其他非明文規範的角色和位置（相當於職權）也尚未發展和分化，團體的任務結構也很模糊，至少對於成員是如此。團體初期領導者很清楚團體的任務，然而和成員在任務的認知往往有差距，例如領導者在初期需要以團體歷程或關係為焦點；而成員可能期待可以傾述困境和情緒。依此，團體初始顯然較適合任務導向的領導，也就是需要給於成員指引或結構，來促進團體歷程和關係的發展。若缺乏指引或結構可能團體內部壓力就會升高，而造成衝突，不論是成員與領導者之間或成員彼此之間的衝突。隨著團體的發展與分化，成員逐漸能夠自主和自動承擔任務，領導也可以逐漸減少指引。當然，由於團體諮商與治療團體和任務團體性質不同，然而有關團體初期領導或有參考價值。

最後，在團體初期成員的衝突原因較複雜，不能完全歸因於移情的因素，也可能由族群、性別、文化、宗教等等因素所引起。在團體情境變數比個別治療複雜很多。若只依據個別治療理論以移情為焦點，顯然相當不足。然而，為了提升領導效率而改變角色，也得說出個道理來。

結論

由於團體諮商與治療的情境之多層面，複雜現象遠超過個別諮商與治療。若侷限在過去已經發展完整的個別諮商與治療理論，固然不足；然而試圖只以實徵研究發現去修改或彌補，以作為團體治療理論的依據，顯然也不足。由於團體的多面性，或許可以引進社會學相關領域的理論為輔，以補足只使用心理動力論的不足。其次，最好在實徵發現之應用，尚能佐以理論或原理詮釋，使得在理論上可以維持系統化或維持統整。由於不論採取個人內在精神取向的治療或人際取向的治療，團體歷程的催化都是共同的核心工作，而前述三個議題都與團體歷程和領導有密切關聯。雖然傳統分析論在領導者所扮演的角色和團體三個層面的主張

仍有待商議，然而至少有其理論根據。反而後來學者依據實徵研究發現而改變領導作法，這一來是否與理論有統整性或有牴觸性，尚須加以說明。而當前使用最普遍的團體階段模式，則有待理論的支持或團體發展原理的說明。本文所提出三個有待商議的問題，對於團體諮商與治療的理論發展和實務操作，都是重要且值得探究的課題。此外有關團體諮商與團體心理治療，或許尚有其他也值得討論的議題。因篇幅有限，僅提出前述三個議題作為拋磚引玉，期待引起我國的學者或實務工作者的共鳴。睿智者來貢獻創見，同好者來腦力激盪，創出新論，以期我國在團體諮商與治療的發展更上一層樓。

參考文獻

- 吳秀碧（2005）。諮商團體領導原理的建構：螺旋式領導方法。《中華輔導學報》，17，1-32。
- Adler, A. (1930).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New York: Greenberg.
- Adler, A. (1938). *Social interest: A challenge to mankind*. London: Faber & Faber.
- Alexander, F., & French, T. M. (1946). *Psychoanalytic therapy: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 Allen, R. D. (1931). A group guidance curriculum in the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52, 189-194.
- Anderson, S. M., & Beck, M. S. (1998). Transference in everyday experience: Implication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for relevant clinical phenomena.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1), 81-120.
- Ansbacher, H. L., & Ansbacher, R. R. (Eds.). (1956).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of Alfred Adl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Bion, W. R. (1961). *Experiences in groups*. New York: Basic Books.
- Bonebright, D. A. (2010). 40 years of storming: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uckman's model of small group development.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13(1), 111-120.
- Cooley, C. H. (1902). The looking-glass self. In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pp.179-185). New York : Scribner's.
- Corey, G. (2011)(8th ed.).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counseling*. Pacific Grove, CA: Brooks /Cole.
- Corsini, R. J. (1957). *Methods of group psychotherapy*. Chicago: William James Press.
- Cottle, T. J. (1968). The Group as a Unique Context for Therapy.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 Practice*, 5(3), 195-197.
- Fiedler, F. E., Chemers, M. M., & Mahar, L. (1976). *Improving leadership*

- effectiveness: The leader match concep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Fiedler, F. E. (1967). *A theory of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New York: McGraw-Hill.
- Gelso, C. J., & Carter, J. A. (1985). The relationship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Components, consequences, and theoretical antecedent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13, 155-243.
- Gladding, S. T. (1995). *Group work: A counseling specialty*. Englewood Cliffs, NJ: Merrill.
- House, R. J. (1971). A path-goal theory of leader effective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q6, 321-339.
- Jourard, S. (1968). *Disclosing man to himself*. Princeton: Van Nostrand.
- Trotzer, J. (1999)(3rd ed.). *The counselor and the group*. Philadelphia, PA: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 Knight, Z. G. (2005). The use of the “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the search for the bad object in psycho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59(1), 30-41.
- Lewis, C. M., Beck, A.P., Dugo, J. M., & Eng, A. M. (2000). The group development process analysis measures. In A. P. Beck, & C. M. Lewis, *The process of group psychotherapy: Systems for analyzing change*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Maslow, A. 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370-396.
- Maslow, A. H. (1954).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 Mosak, H. H., & Fasula, A. (2011). Transference in the light of Adlerian psychology. *The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67(4), 343-348.
- Moser, C. J., Jones, R. A., Zaorski, D. M., & Mirsalimi, H. (2005). The impact of the sibl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dynamics.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42(3), 267-278.
- Rogers, C. R. (1970). *Carl Rogers on encountering groups*. New York: Harper & Row
- Rosenthal, L. (2005).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group as preoedipal Mother. *Modern Psychoanalysis*, 30(2), 140-149.
- Schindler, W. (1951). Family pattern in group formation and therap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1, 100-105.
- Slater, P. (1966). *Microcosm*. New York: John Wiley.
- Spotnitz, H. (1961). *The couch and circle*. New York: Alfred Knopf.
- Spotnitz, H. & Gabriel, B. (1950). Resistance in analytic group therapy: a study of the group therapeutic process in children and moth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Child Behavior*, 2, 71-85.
- Trotzer, J. P. (1979)(1st ed.). *The counselor and the group: Integrating, theory,*

- training and practice*. Philadelphia, PA: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 Trotzer, J. P. (1999)(3rd ed.). *The counselor and the group: Integrating, theory, training and practice*. Philadelphia, PA: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 Trotzer, J. P. (2006)(2nd ed.). *The counselor and the group: Integrating, theory, training and practice*. New York, NY: Routledge.
- Trotzer, J. P. (2013)(4th ed.). *The counselor and the group: Integrating, theory, training and practice*. New York, NY: Routledge.
- Tuckman, B. W. (1965). Developmental sequences in small group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3(6), 384-399.
- Tuckman, B. W., & Jensen, M. C. (1977). Stages of group development revisited. *Grou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2(4), 419-427.
- Vander Kolk, C. J. (1985). Introduction to Group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Columbus: Charles E. Merrill.
- Yalom, I. D. (1986)(3rd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 Books.
- Yalom, I. D. (1995)(4th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 Books.
- Yalom, I. D., & Leszcz, M. (2005)(5th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 Books.

收稿日期：2015 年 9 月 25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15 年 9 月 29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5 年 9 月 29 日

About Groups, Had Yalom and Others Had a Clear and Integrated Illustration for Their Theories?

Sophie Woo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bstract

A very clear and complete nautical chart is very important for a navigator. Similarly, a clear and systematic theory is a very important guide for a counseling and therapy group leader to lead an unstructured group. Yet, when carefully and conscientiously looking into contemporary psychodynamic-oriented theories of group counseling and therapy, one may find some obscure and vague issues. The application of individual therapy theories into group therapy produces some issues in group theories themselves. At least three issues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First, there are three dimensions in a group process. In general, if the postulate of the group as a whole was not used, these group theories only discussed two dimensions (i.e., individual and interpersonal level), and a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group as a whole was vague or ignored. It is vital to provide a clear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dimension of the group as a whole. Second, Tuckman's(1965) model of the stages of group development is applied to most psychodynamic-oriented theories of group counseling and therapy. However, Tuckman's model was based on his research. It can only tell us about the traits of each group stage but not about how the group process developed. Thus, there is a need for a rationa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group proces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leading tasks and strategies for each stage in the group process. Third, by following Freud's three basic pillars (i.e., neutrality, abstinence and anonymity) to lead a group, the leader has to believe that the client /member searched for a bad object, and the 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bad object reenactment was used.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hat not every member will search for a bad object in the group and that the transference can't be manipulated by the leader either. Although Bion(1961) and Yalom(1985, 1995, 2005) claimed that some directions and structures are necessary in the very beginning phase of leading a group, they did not give any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but research evidence from comparing different leading styles. In summary, the three issues mentioned above are explored and further discussed. Wish modification of these three issues will be benefited from some thoughts in this articl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ounseling and therapy group, group process, group stage, group dimension